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



DENGLIANGMING ZIXUANJI

邓广铭自选集

邓广铭◎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

DENGGUANGMING ZIXUANJI

邓广铭自选集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JINIANJI

邓广铭◎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广铭自选集/邓广铭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81119-429-6

I. 邓… II. 邓…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0081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DENG GUANGMING ZIXUANJI

邓广铭自选集

邓广铭 著

项目统筹:杨小兵 责任编辑:赵恒
责任设计:王征发 封面绘画: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亚利 责任印制:沈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8年12月第2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3.75
字 数 522千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汤一介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何兹全 宋贵伦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黄枏森 龚育之 童庆炳
满运来 蔡赴朝 戴 逸

编委会主任 常 卫

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史秋秋

编委会副主任 张文启 张兆民 孙向东 杨学军 陈 鹏
陈之昌 陆 奇 辛国安 庞 微 单允茹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卢颖华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杨小兵
杨念群 吴国盛 陈平原 陈 来 陈雨露
郑红霞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崔新建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10种，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 委 会

2008年11月

第1版自序

我现在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编选了一本我的《学术论著自选集》。编入的论文，最早的，是1936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前后所作，最晚的，则是今年（1992年）刚刚写成的，其间的时间跨度已在半个世纪以上。随着社会政治的剧变，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及价值判断，前后都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在编选的过程当中，在取舍的问题上，是煞费了一些考虑，先后颇有一些反覆的。然而不论几经周折，却毕竟把它编定了。

选录在这个集子中的文章，虽有少数涉及唐代的史事或书册的，而绝大部分则是有关辽宋金先后对立时期的一些人和事，特别是两宋的典章制度，政治上、军事上和学术文化方面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以及它之所以长时期不曾有所拓展改变，从主观方面说，当然是我自己学力的局限使然，我根本不具备淹通古今中外的条件，不可能从事于浩瀚无垠的古今中外之学，所以只有画疆自守。（然而我也长时期担任过中国通史的教学工作，所以我的旁骛别出、上下古今地求索考论的文章也写了不少，只

是一概都未收入这本选集中来。)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的了。

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在我的前辈学人以及与我同辈的学人当中,以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为主攻对象者,为数实在太少,因此,每当我偶有一得而写为文章时,也大都受到我的导师们的鼓励、赞许,他们主要是为了加强我的信心,提高我的兴趣,使我能够在这个既定的研究领域内向更深更广处继续努力,以填补在我国史学界相对说来的一个空白点。

二

我把宋辽金对立斗争时期的历史作为我进行研究的主攻对象,而在这一时期内的错综复杂的事物和问题之中,我的研究取向则是倾斜于政治、军事、学术文化诸方面。就此诸方面的静态现象说,是一些典章制度之类的东西;就其动态现象说,则离不开从事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等事业的人。

宋政权建立之后,虽在逐步地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而在太祖太宗在位期内,其最高统治集团当中的人物,较能善于运用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的,或者说,真能顺应所处的时势而制订一些措施,可以勉强算作政治家的,只有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人。被后来人称之为北宋开国元勋的赵普,只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庸琐鄙夫,是夤缘时会而成

为政治上层人物的。以阴谋夺取到皇位的赵光义，则是一个阴贼险狠，既忌刻又狡狴的人。赵普与赵光义，在平时，只会鬼鬼祟祟地玩弄一些小动作、小诡计，当面对国家军政大计，需要作出决策时，他们却绝无深谋远虑，不可能盱衡全局、高瞻远瞩地做出筹划的。而不幸，在北宋建国的最初四十年内的创法立制以及一切与开国规模有关的大经大法，除一部分为赵匡胤所授意外，其他则几乎全是由赵光义和赵普所制定的。收录在这本《自选集》中的，关涉到北宋的开国和皇位继承、北宋的家法和政治改革运动以及对赵匡胤的评价诸文，全都是为了论证和阐明我的这一思路和见解而写作出来的。

北宋前期在行政体制上所逐步提高的中央集权，实际上只是要把大权集中在皇帝的手中。所以，不论在设置军政机构时或张官置吏时，宋太祖太宗所一贯执持的一个原则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两句话的实质内涵，就是要在各种行政机构和官员之间，把互相牵制的作用充分加以利用。例如，前代的宰相事无不统，而北宋建国之后却把兵政分属于枢密使副，把财政分属于三司使副。又如，募兵制度本从唐末五代以来才逐渐形成，而力惩五代弊政的宋太祖，却因为它能把居民与职业兵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人群而对之大加赞赏。然而，贯彻施行这一原则的结果，却使得官员名额冗滥而行政效率极度疲缓；招募入伍的兵丁数量与日俱增而战斗力却极度疲弱。总之是全都发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收在这本《自选集》中的《〈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与凡例》、《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诸篇，全都是指陈这些制度的流弊的，虽然有的还只属于发凡和举隅的性质。

北宋政权不是没有敌国外患，然而在宋辽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后，举国的士大夫和仕宦阶层中人，却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应否及如何变

法改制的问题上；宋廷南渡以后，政治经济诸方面应兴应革的问题依然大量存在，然而因其处于北宋政权刚刚为金人所覆灭、金国兵马也还经常南下侵逼的情况下，举国的官绅军民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抵御金军的进犯、如何恢复故疆和报仇雪耻的问题上去。因应于历史格局的这一剧变，我写出了《南宋初年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和有关岳飞的战斗生涯的几篇论文。《辛稼轩归附南宋的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等篇，也是属于这一系列的。

三

宋代的文化学术，较之它的前代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从其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之并驾齐驱的现象来说是如此，从其每种学科中都先后出现了造诣高深的学人与论著来说也同样如此。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除开物质方面提供了日益增多增强的凭藉而外，主要原因应在于宋代儒家学者的觉醒：他们都想重振儒家学派，使其能凌驾于佛道两家之上。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需要把儒家的学说加以丰富、充实，于是而有人援释老以入儒，有人则援名法以及诸子百家以入儒，遂使宋代的儒家学说真正蕴有了内圣外王的内涵，到达了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而在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其学术造诣的博大精深，确实足以作为这一时代学术界的代表人物的，则舍王安石莫属。由黄梨洲全谢山等人合力写成的《宋元学案》，应当算是一部很好的宋元学术史，然而竟把《荆公新学略》与《苏氏蜀学略》一并列置于全书的附庸地位，这是沿袭了从南宋以来因政治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偏见，是有失公允的。收在这本《自选集》中的文章，既有论述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也有论述他在北宋一代所应享有的学术地位的。其目的，只是要用一些彰明较著的历史事实，纠正一些传承已久的偏见

和谬见。

把理学作为两宋儒学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流派是完全错误的。洛阳的程颢程颐与关中张载之以理学名家，都是在王安石二次罢相以后的事。哲宗元祐(1086—1094年)期内，与蜀、朔两党并立的洛党，也还只是以程颐为首的政治小集团。终北宋之世，理学家并未形成一个较大的学术流派。宋廷南迁之后，二程的学生们大都从事于政治和学术的活动，又大都依傍师门以为重，而张栻、朱熹等理学大师又勃兴于其间，理学乃成为举世声望最高的学派。然而在浙江东路的婺州、温州一带的一群学士大夫如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人，却不肯依傍理学家的门户，群趋驰骛于财赋兵刑等经世致用之学。而永康陈亮则更特别强调事功的重要性，强调抗击金人、报仇雪耻的重要性。他痛斥那些“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理学家们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因为朱熹奉劝他“拙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他认为这全出于朱熹对他的思想和主张的误解，便和朱熹展开了一场关于“王霸、义利”的辩论，成为南宋思想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而不幸陈亮对王与霸、义与利的一元论的理解，不但未能通过这场辩论为朱熹所接受，而到清代的全谢山修撰《宋元学案》时，依然说陈亮是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人；直到近几年内新出版的有关古代思想史的论著中，仍未改此说。收在这本《自选集》中的《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是我特地为澄清这个被历代学人误解了八百年的哲学命题而写作的。还因为陈亮是一个爱国志士，一生却穷困潦倒，历尽坎坷，实在令人同情，所以，我对他一生中某些异常遭遇也写了几篇考辨文字，一并收入此《自选集》中。

四

“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致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相。

收录在这本《自选集》中的许多篇文章，可以说，都是因为我加意地对于有关史料作了充分的鉴别、审查和由此及彼的比勘考证，然后才使研讨的问题得出了较新的成果的。例如：

研究辽朝的军事制度，理所当然地要以《辽史·兵卫志》作为主要依据之一，然而该《志》所载《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诸条，却是从元代的书坊中人草率缀辑而成的《契丹国志》稗贩来的，遂致产生了许多错误。如说辽太祖时“官卫内虚，经营四方，未遑鳩集”，即尚未有“御帐亲军”，是到辽太宗时才“选天下精甲”而设置的，为数且为“三十万骑”，与述律皇后的“属珊军”二十万骑相加，共有“侍卫亲军”五十万人。这条记载与《辽史》中其他纪、志、表、传中的记述全相悖戾，却为历来考校《辽史》者所全未触及。我认为这是有关研究《辽史》的一大关键问题，所以就此问题做了一番穷源正误的工作，成为收入这本《自选集》中的《〈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一文。

在对有关史料的审核、鉴别、考证等类工作上，我用力最多的，是有关岳飞的生平及其在战斗实践中的一些业绩。原因是，有关这类

问题的记载，除了当时的诏令、指挥、文牒和岳飞的奏疏、战报等原始资料全部可以凭信外，在岳飞被杀害前后的长时期内，即从绍兴八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38—1155年），南宋政府的史馆一直为秦桧及其子弟党羽所把持，他们不但尽可能隐匿岳飞的一些功状，还为岳飞虚构了一些罪言罪行，遂致官方的记载诸多失实；与岳飞具有亲故关系的文人学士们，估计当时必有不少涉及岳飞行实及其战功的记述，然经历秦桧凶焰长期薰灼之后，又必大量地自动或被动地焚毁泯灭，其间之幸而能保全流传于世者，有的固极确凿珍贵，有的却也只是得诸传闻，捕风捉影，不足置信。到十二世纪之末，上距岳飞的惨遭杀身横祸已及六十年，却还没有出现一篇稍具首尾的岳飞的传记。此时岳飞的诸子全已亡歿，于是，生于1183年的岳珂，虽还年在弱冠，却遵其父岳霖的遗嘱而于1199—1203这五年之内，奋力写成了《鄂王行实编年》一书。岳珂之生上距岳飞之死已及四十余年，而当其执笔写此传记之时，上距岳飞之死则已几近六十年。不论岳飞生时的部属或友辈，全不会犹有存者，调查访问自无可能。特别是岳飞渡江南下前的一段历史，更莫可踪迹。然而岳珂竟充分驰骋其孝子慈孙的用心，全凭想象而把这一大段空白进行了详细的填补。但他对其祖父早年之因家境贫寒而曾一度到邻县安阳的大户韩家作庄客，却讳莫如深；对于岳飞早年曾娶妻刘氏，并曾先后生了岳云、岳雷二子，在岳飞离乡南渡之后不久，刘氏却又改嫁了别人等事，岳珂必都知悉，而他却也引以为家门之耻，同样讳莫如深，以致后来的修史者竟把岳云认作岳飞的养子，且不知岳霖、岳震、岳霆之生母李氏，乃是岳飞知刘氏已经改嫁之后在江南所续娶者。另外，为了填补这一大段空白，岳珂还虚构了许多无稽之谈，例如说岳飞曾经使用女真语言而混入金人军营、刺探得金军的一些情况等等。至于岳飞南渡以后，特别是跻

身大将以后的一些功状言行，被岳珂因心存避忌（或因不明原委）而任意隐没，或要锦上添花而以无为有者，亦颇不少。大奸大恶的权相秦桧，所加诸岳飞父子及其一家的横祸，是在千古的人心中难以泯灭的一桩罪恶行径。因此，尽管岳珂为岳飞所作传状有很多不尽不实之处，千百年来的读史者却把它奉为信史而加以尊信。但是，对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或者说，对一个具有思辨能力与治史基本训练的人说来，则不能专从诛恶扬善的观点出发，而应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以对证分析，使一些真伪杂糅、是非歧互的记事真能水落石出，真情大白，而不应把岳珂的记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当我把岳飞这一历史人物作为我的研究课题之后，我力求能把这一课题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而绝不再抄袭由岳珂铸造的那些虚妄无实之词。这一意念指使我把岳珂的一些谎言和误解要尽可能予以揭穿和校正。《自选集》中所收有岳飞的一些考证文章，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的一些问题，则在《岳飞传》中已大致进行了辨析了。所不解者，是至今还有人突不破旧观念的束缚，还认为凡经岳珂笔、削者必都有其理由或依据，未可轻予否定。此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我以为，是由于思想方法没有受到科学洗礼所致。

五

在编选这本《自选集》的过程中，经常引起我的惭愧的一事是，我虽把辽宋金对峙斗争的时期作为主要攻治的一个特定历史段落，然而我竟没有像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那样，写一部详赡丰实的辽宋金史出来。在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辽宋金史部分虽是由我执笔写成的，然而仅有十三万字左右的篇幅，当然难免挂一漏万之讥诮。我今已届耄耋之年，虽还时常萌生一些非非之想，要继续写作一些什么，

藉以发挥其余热，可是就在这些非非之想当中，也竟未敢把撰作辽宋金史的事包括在内。

收入这本《自选集》中的，共为文38篇，为字近五十万，其未被选入者，不论就篇数或就字数而论，大概都要超过此数，甚或还不只倍蓰。但是，即使把这些已收入和未收入的文字合并来看，究竟其中能有几篇像我所钦仰的前辈学者的著述那样，能在这一阶段的史学研究领域当中起到略似里程碑式的作用呢？这大概属于虽非绝无而也应是仅有的吧。这也是经常引起我的惭愧的另一事。

南宋的那位堪称特立独行的思想家陈亮，曾自称他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本领。“五·四”时期那些从事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都是具有这种英勇的气概和气魄的。我自己呢，则属于“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一类人。因此，我所写出的文章，只是阐发我自己的见解，而绝无代任何一位圣贤立言的教条主义的八股文式的作品；而且只是实事求是地，以符合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绝不去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所以，当有人学取日本某些学者的办法，把出现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度照搬到中国来，把唐宋称为庄园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时，我认为这真是把历史当成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一百个大钱了，这不免太践踏了历史。我写的《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可作为我反对此类作风的证物。这也就是说，如果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对读者还多少有些用处的话，那也只是我所信奉的这条实事求是的治学准则所起的作用。

六

敝帚自珍，似乎是一般舞文弄墨的人所共有的习性，我却因为素

性懒散，也不曾考虑过编印文集的事，所以独独没有这一习性。文章刊出之后，从来不加剪贴、归类、保存。到了应约编印这本《自选集》时，搜集旧作，几乎成为灾难性的繁重劳务。我烦请好几位年轻朋友为我去翻索引，查目录，抄出之后还须对引文，检索出处；及用电脑输入之时，因逐篇文字大都有或多或少的字句更动，且间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更动，给予操作者金晨女士以无限麻烦，而她却一直不惮烦劳地反复照改。而在此多项工作的反复进程当中，贯彻始终、通盘负责的则是我的三女小南。她不但校对了字面上因屡经传抄与打印而发生的鲁鱼亥豕一类差错，不但改正了原文中一些病语病句，而更难得的是，她还发现了我对有关某事的史料搜讨得不够周全，以至于论断发生了疏误。例如，在《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文中，当谈及王安石变法过程中重视法治精神时，我原仅依据《文献通考·选举考》和《宋史·选举志》的记载而作出表述说：“在熙宁六年明令规定，凡是由进士和诸科出身的人，一律须再参加一次‘律令大义或断案’的考试，合格后才能委派官职”，经她指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在熙宁四年十月、六年三月和八年七月都有更加详细的记载，我才又得据以做了改动。经她指出而做了补充或更改之处尚多，都使得收入这本《自选集》中的论文的质量更加得到保证，用特在此加以记注。

1992年11月3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自 传

我，邓广铭，于1907年生于山东北部的临邑县。这县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在清代近270年的时间内，临邑县没有一个进士及第的人，也没有因其有一技之长而闻名于世的人。其文化之落后可见一斑。

我从六岁起进入村塾读书，塾师是一位秀才。那时恰为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也已缓慢地传布到我们那村塾里。但读教科书只是我们的“余事”，正规的读物，却还是《三字经》和《四书》《五经》之类。我家的一部《凤洲纲鉴》，也被塾师借去阅读，并从中选取一些篇段向我们讲说。我们也曾抄写、阅读和背诵过唐宋八大家的一些文章。到1920年暑假后我考进县城中的高等小学为止，我在村塾中共呆了七年半的时间。在此期内，我备受塾师赞赏，可以说是一个“小时了了”的学童。

在这七年半的学习生涯中，虽非全无所获，然却只是从高头讲章上、从只会做八股文的塾师的讲解中去理解《四书》《五经》和《纲鉴》、古文等等，实在未免既低，且俗，且陋，怎么也不配称之为启蒙教育。

总结我在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三年的经历，似乎也谈不到

有何值得称述的收获。校内只有一位从外县请来的教员水平稍高，据闻他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是一位高材生。他当时居然买了一部《胡适文存》，并把它借与我看。我读过之后，对所谓新文化运动仍感茫然摸不着头脑，然而对其中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吾我篇》、《尔汝篇》则颇感兴趣（因为我读过《诗经》）；另外，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这许多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名字，也都在我的脑子里占据了地位。

1923年夏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这所学校，在济南虽不算最高学府，但从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性来看，在当地各校中却是居于首位的。校长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人，他倡导学生多多阅读上海和北京两地先后创刊的几种报刊杂志，例如《创造月刊》、《京报》、《语丝》、《现代评论》等等；还特地延请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王星拱等人来校作短期讲学，这使我们的眼界大为开阔。

这时校内高年级的同学创办了一个“书报介绍社”，经销北京的北新书局、未名社、朴社和上海的创造社所出版的各种新书。我在进入二年级后也成为这个社的成员，每周三次在课外去服务两小时。这使我得有机会对南北各地所出新书恣意浏览。其中给予我印象最深的，在译品方面则是鲁迅所译日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还有《沉钟》上所载杨晦译出的罗曼·罗兰《悲多芬传》的一篇“导言”；在新印的古籍方面则有顾颉刚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几种《考信录》）。是在这一期间，才使我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崔东壁的几种《考信录》使我了解到治史考史工作之大有可为，而罗曼·罗兰一篇短短的《悲多芬传·导言》，也使我对历史上一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